

涉笔成趣

我们的部门有五六十个人,还有两三个副主管,除了我和小郭是办事员外,其他都是领导。小郭比我早进山门,很有经验的样子,在我面前,他觉得自己也算半个主管了。

每次,副主管小阳领着我们去各地检查。小郭总是把小阳跟得紧紧的。相对于小阳,我更害怕小郭,因为他说话时,总喜欢又起兰花指,然后用手指点着你,手势幅度很大,并配合着夸张的肢体扭动,就像练舞蹈中“大大,二大大……”右手有节奏地在空中挥舞。每次小阳说一句话,他马上颌首低眉表示赞同,一副谦恭温顺的样子。每每我说一句话,他总要驳斥,说你哪里哪里说得不对,回到单位后,然后捂着嘴巴和科室同事们说,今天他又在哪里说了哪句错话了,这一点他总是记得很清楚。

一天,我的一位老同学在广东那边赚了不少钱,准备回仙居投资,创办一家幼儿园。他办手续时,我们碰到了,邀请他到办公室坐一下。我开玩笑地说:“老同学,在外赚到钱钱了,不忘记回报仙居人民啊!”小郭听到了,马上板起脸孔训斥起来:“你这句话说的口气太大了吧,你以为你是县长啊,还回报老家人民。”

同事的老公已退休,我们聊起说,你夫君当年还是干了不少实事的。小郭马上就跳过来了:“哎,你说这个话有意思吗?人家早已不当官了,你还说,有什么意思啊?”然后,他又像扭秧歌一样扭动着身姿,手不停挥舞,搞得我

们很尴尬。反正我每说一句话,他总会烦,总是不满意,说你不应该这样说,应该这样说,弄得我一见到他就害怕。

单位进进出出的人很多,不断地吐故纳新,每年都有老人退休,有新人获得提拔重用。作为仅有的几个没有被提拔的办事员之一,我看出他有些失落,有些怀才不遇。虽然小郭嘴上说,他这个人提拔没有太多想法,当办事员其实挺好的,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,哪时需要哪里钉。不过据同事小伟说,经常看到小郭手里提着大包小包,往老总家跑,但不知为啥老总却忘记了。

天气渐渐凉了起来,街道两边的树叶开始黄了,小郭的鼻炎犯了,每到冬天,经常流着鼻涕,每次和他出去时,他也从不带纸巾,都是用手往鼻子左右“吡吡”擦一下,两个鼻孔喷出两股黄色的液体,他用手把鼻孔里的余液往地上一甩,然后左右两只手在不停地互相摩擦着,等手上的液体摩擦干了,就完事,就算擦干净了,也不见他洗手。

有一次东方百货商场在搞活动,我在柜台里看到了一件漂亮的苹果牌西服,大家都说穿起来“帅呆了”,我自己也感觉很不错。

小阳说,明天我们到城峰中学检查。

第二天一早,我把笔挺的西服穿在身上,和他们一起去城峰中学。路上走着走着,突然听到小郭的鼻孔有异样的声音,我知道他鼻涕又要出来了,于是警惕地和他拉开一点距离,想让他把

鼻孔里的秽物清理干净再说。远远看见他用手指按在鼻子上左右擤了两下,再往地上甩了甩,那黄液在空中甩出一个美丽的弧度后直直地钉在墙上,没见他擦手,也不见他洗手。然后,他跑着追上我,再和我并肩走,然后,慢慢靠近我,和我拉近,用手伏在我的肩上,不停地说话,企图分散我的注意力,突然那只擦过鼻涕的手往我衣服上捏了两下,松开后走了。我当时想说什么,但想起有同事的忠告:你是那么老实的人,又弄不过他们的,万事要忍啊。于是硬忍住没有发作,回家后,花了几十元钱拿到干洗店把那件刚穿的新西服重新洗了一次。

那段时间,我很郁闷,经常跑到和我同病相怜的小平办公室去诉苦,寻找安慰。其实那时小平过得也不好,也很压抑,我们性格上都是一样的毛病:老实又无用,算是难兄难弟了。只是每次诉完苦之后,心里愈发郁闷了。

不久,小郭同志终于要调到其他单位去了。

临走前,我们在办公室说着话,副主管小阳正在隔壁办公室,听到小郭的声音,小郭猛地握着我的手,一本正经,大声地以能让隔壁的人也能听到的分贝,充满感情地说:“杨,我马上就要走了,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交托给你。”

我被他这般郑重严肃的样子吓坏了,受惊般地忙问什么事?小郭说:“我要走了,小阳主管是我最近放心不下的,因为他办事有些粗心,我求求你了,以后,你一定要好好辅助他的工作,我求求你

了。”他一再反复地多次用“我求求你了”这句话来恳求我,眼镜后的那双眼睛,仿佛在努力地挤出盈盈而深情的泪光。我肉麻地感动着,内心被他的演技深深震惊了。估计小郭把他自己都感动了。可惜的是,小阳在隔壁忙着,没有注意听,小郭略略有些失望。不过小郭还是反复交代,今后如果小阳主管家有什么事,无论如何一定要通知他,千万不能忘记他这个兄弟……我知道,他即将去的单位,也是我们部门所涉及检查的业务范围……

时光荏苒,世事难料,因为工作踏实,人称“老黄牛”的“难弟”小平同学已成了县里某领导的秘书;而当年那个口口声声说“存在即合理”的老总,退休后却成了信访专业户。有一年,小阳的奶奶去世,我牢记小郭的嘱托通知他,却被他抢白了一通:“这种事你也要和我讲啊,以后不要说了。”因为小阳已换了岗位。

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席卷大地,那段时间,我们一直在全县各地调研。

那天,我们来到一家抗战疫情的一线单位开座谈会,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,眼角的余光中,我看到了小郭的身影,他还是那样,看到认识的领导就一副笑容可掬、热情洋溢的样子,伸出双手握不停,并在会场上不停地走来走去,似乎想引起我的注意,但我不敢回应他的热情……

我想,小郭同志应该当上科长了吧。

阡陌岁月

一元钱国债

金时锋 (穿了一辈子制服)

别说年轻人不相信,连我自己也难以置信:这么大的一个国家,竟发行票面金额一元钱的国债。你不能不信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我们国家发行的国债中确有面值一元的,我就保存着这么一张国库券。

国库券正面图案是大型的挖煤机,在大写一元的汉字下,标有年号1982年,主色是浅绿蓝色。有意思的是背面,在这张和伍元人民币等长略宽的票幅规格上,全文印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八二年国库券条例》,共十一章约700字。在一张纸币上印国务院条例,让人觉得很新奇,估计以往没有过,今后也不会有。字很小,我拿放大镜能看清楚。中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印章很大,后来发行的国库券中,背面只有图案不印条例,且财政部的印章也小很多。一元券存世量很少,被收藏界称为国库券中的“猴票”。

1982年,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四年,遇到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,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,经济下滑,国库收支严重不平衡。为了调整和发展国民经济,适当集中各方面财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,国务院确定发行国债,筹集资金,摆脱困境。

考虑到那时人们的生活都很困难,发行的国债分为个人购买和单位购买两种,票面金额为六种:一元、伍元、拾元、伍拾元、一百元、一千元。为了给国家分忧,人们在领取工资时不管多少,自愿认购。众人拾柴火焰高,那一年,国家发行的20亿元国债完成了20.3亿元。

在今天投资国债是很受追捧的,因为老百姓手里有钱,投资房地产、股票、基金靠不住,国债最稳当,最放心。债务人是国家,还款保证是国家财政收入,不存在信用违约风险。今年初发行的凭证式储蓄国债,三年期利率3.00%,五年期利率3.12%,尽管利率不算高,一发行很快就“秒杀”。

1982年发行的国债利率很高,国务院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:单位购买的,年息定为百分之四;个人购买的,年息定为百分之八,还本付息从第六年办理。这么优惠的条件却没人能去投资,说穿了就是手里没有钱。每月的工资凑合着对付每月生计,计划不好就会青黄不接,手里有余钱的人很少。现在年轻人中有不少超前消费的“月光族”,“月光族”实际上也是“啃老族”,他们有底气这样消费,这是因为一旦遇到什么情况,有人会施以援手。那时很多人都是“月光族”,每月给家里补贴正常,指望家里帮忙很难。日子过得拮据,买国债凭的就是思想觉悟。

这张一元钱国库券是妻无意中留下的,说起来还饱含辛酸。

那时候我在四川某部队服役,妻尚未随军,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在当地一个塑料厂上班,每月拿四十五元工资。孩子日托,为了省钱,厂里的三个女工把孩子合送附近一户人家照看,每人每月八元。买奶粉水果开销二十多元,自己从家里拿大米,妻说不好意思从婆家拿,每次都回娘家拿米。吃饭花十五元,还有人情往来,我每月再接济一些,精打细算过日子。

塑料厂是个社办企业,八九十人,在当地算效益比较好的。发行国债时,镇里分了六千六百元的购买指标,六千元单位购买的好办,对于六百元由个人购买的指标,厂里定了原则:厂领导每人二十元,中层每人十元,基层每人八元,职工每人五元。妻担任包装小组的组长,买了八元国债。

小组里有位大姐家在农村,爱人因病丧失了劳动能力,治病花了不少钱,家里有三个孩子,家庭十分困难。五元钱现在不算啥,那时对一个困难家庭就是个事,要知道,那时的大米不到两毛一斤呢。五元钱能买二三十斤大米!老大姐买国债面有难色,妻悄悄告诉她,啥也别说,先买下吧,而后转给我。这个月妻买国债用了十三元,能开支的钱只有三十二元。

三十二元显然难以凑合母女俩一个月的生活,妻是个要强的人,不愿把困难告诉我和家里人。她明白嫁给军人当个军嫂意味着什么,多大的困难只是左肩换右肩独自承担。哪怕生孩子的大事,那那部队正在野外进行战备演习,我请不了假,妻在一名女工陪同下骑车到医院,医生责怪她胆量太大。为了生小孩“有气力”,这名女工回家煮了五个“荷包蛋”,让她吃下。也许是苍天保佑,也许是运动了的原因,也许是五个鸡蛋的作用,到医院不到半小时顺利生下孩子。

为了克服眼下困难,妻想到了一个创收的办法。她在海边,从小学会一门手艺:做鱼篓,卖给渔民出海捕捞装鱼用,一担卖七八毛钱。和竹子打交道,最容易伤手,弄不好就伤筋累骨。刚进厂时,妻搞过创收,上班带孩子太辛苦,放下了。眼下不管这么多,买来竹子,说干就干。把大竹子劈成八瓣,小竹子六瓣,用篾刀分离篾根和篾里子,做篓用得着的是篾青,篾里子晒干后当柴火卖钱。白天上班忙,晚上带孩子睡觉后在走廊的路灯下做鱼篓。同宿舍的女工很照顾她,有帮忙带孩子,有帮忙打下手,熬更苦十多天,做了二十多担鱼篓。

满心欢喜卖鱼篓换钱,没想到因刮台风渔船不出港暂停收购。愿望落空了,生活要继续,想到最简单的救急办法向厂里预支下月工资,好心的厂长很理解她的难处,厂长说,预支没必要,传出去也不好听,要不我借给你十元,要不把刚买的国库券转给我。妻把十元国库券转给厂长,换回十元钱。

第二年五月,妻带着剩下的三张一元面值国库券随军到部队。那时候部队发行国库券的面值都在五元以上,没见过一元的。集邮的同事见了后爱不释手,软磨硬泡,我忍痛送出去两张,剩下一张夹进记事本留作纪念。

一元钱国债的年代慢慢远去,经历者的心头却难以忘怀。每看到这张一元国库券都会生出无限感慨:珍惜好日子,别忘苦日子,舒心地过好每一天日子!

同事小郭

(当年宁夏支边,今日仙居修仙) 杨坚



青青子衿

醉翁操

松庐

轻寒。秋山。听泉。似琴言。涓涓。谁人转袂徐徐弹?驻得长日清闲。桐影偏。霞散落樽前。敢学青莲为酒仙。

但吟蜀道,羁客行难。但吟静夜,羁客徒生鹤怨。飞海蟾兮蟾娟。念海峤兮怆然。西风吹莫还。苍茫浮凉烟。遥夕耿无眠。起看松岭霜月悬。

故人故事

山崖边的野菊花开了,一丛一丛,金黄色的花朵,闪着金色的光。墓前的菊花也开了,白色的花朵纯净、素雅,亦如雪白的丝帛。在风雨的侵袭下,墓碑上的字已经斑驳,黯淡,仿佛风霜中的老人。我的母亲就在里头,我在外头,我们隔着生死那道门,隔着思念无尽的海。我已经记不清母亲的容颜,只依稀记得母亲的背影,微微弯曲的母亲的后背。

夏天的晚上,一间十几平米只有前门和前窗的低矮房子,闷热得像蒸笼一样。晚饭后,母亲搬出了几把长凳和一块厚木板,放在屋前的院子里。我们姐妹和弟四人头挨头躺在木板上乘凉。母亲摇着扇子一边为我们驱赶蚊虫,一边为我们唱起歌谣。深蓝的天空上,云朵在月亮身边踟蹰,星星眨着迷离的眼睛。母亲的歌谣声如清亮亮的水在流淌,我们在溪水中溯游,渐渐沉入梦乡。

更深露重,她担心我们幼小的身躯着凉,背起我们上楼去睡觉。木梯又陡又滑,她背着我们,一手紧紧抓住木梯向上攀,一手托住背上的我们。我常听到母亲的喘息声,她爬几道就稳住脚吸口气,生怕一不小心把我们和她自己一起摔下来。她小心地把我们放在蚊帐里,扇了一下扇子,又下楼去在煤油灯下做手工。可是楼上太热了,我们热醒了,哭着叫妈。母亲又爬上楼,把我们一个一个背下去,在朦胧的睡意中,我们在她的背上晃悠着,一趟又一趟,楼上又楼下。母亲的背就像那弯弯的月,驮着我们在童年的星空中徜徉。

寒冬腊月,刺骨的寒风冻得人缩起了脖子,池塘里结了一层薄冰。快过年了,一大早,母亲提着两大桶的被单和衣服走向池塘,她弯下腰,用石头敲碎了冰,开始洗衣。她使劲地刷刷刷,棒槌捶着衣服咚咚地响,河面上回荡着响亮的棒槌声,惊得鱼儿游向水深处。母亲的手已经冻得红肿,她没停歇一会,要赶在中午前洗完。她的背也越来越弯下去,手抓着被单在水里揉,再用力拧干。她一洗就是三个多小时,冷风冰水冻得她鼻子发青双颊通红。她直起身,捶捶酸疼的背,理了理被寒风吹乱了头发,提着一

满桶被单衣服回家。已近中午,她要给我们做麦面吃。背弯下去了,双手使劲地揉着粉团,头发上落着点粉。洗了一上午的衣服,她已经很饿很饿了,但她矮小的身躯里好像有无穷的力量。双手握着擀面杖,用力地推开,一遍又一遍。很冷的天气,母亲的额头上却冒出了汗珠。面皮摊开,擀成薄薄的一层,又折叠起来切成细细的条。灶间烟雾腾腾,她抖抖面,放进烧开的锅里。等到热气腾腾的面盛出来,母亲才歇口气,看着我们吃得很香,她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意。热乎乎的面,干净又暖和的衣服使我们在整个冬天里很温暖。母亲的背就像那一艘船,渡我们走出艰难的岁月。

夏日炎炎,屋后的田野上稻子成熟了。一眼望去,稻田就像金色的海洋。母亲握着镰刀,匍匐在稻田里割稻子。汗珠滚滚,湿透了头发,湿透了后背。汗落无声,落在滚烫的泥土里,落在金灿灿的饱满的谷粒上,仿佛开出了金灿灿的花,是母亲脸上盛开的花。她喜悦地喃喃自语:“这一季丰收,可让我们一家吃上七八个月。”她继续挥着镰刀,背弯得像沉甸甸的稻穗,起伏在滚滚的稻浪中。

刚过了立春,严寒还没有退去,所有的生物还在冬梦里沉睡。母亲挥着锄头翻地种庄稼,她要开出一片地,种上番薯、土豆、玉米,那些能填饱肚子的食物,让我们在青黄不接时不至于挨饿。母亲用锄头平整了地,又弯腰播下了种,盖上塑料膜。她从早忙到晚,拔草、浇水、施肥,一次次面朝黄土背朝天忙个不停。几阵春风,几阵春雨,那些庄稼呼啦啦地往上蹿,开花的花,抽穗的抽穗,结果的结果。到了四月,各家各户的米缸见底了,愁眉不展地向别人家借米。我们却吃上了香喷喷的玉米棒,喝上了甜丝丝的红薯粥。

我们一天天长,母亲的头发也一天天变白。小妹16岁那年,忽然得了很重的病,头面浮肿,双腿无力,台州医院治疗了几次都不见好转。母亲背着小妹辗转于黄岩、天台、玉环各地求医问药。从家到车站要走半小时的路,她背着小妹出门到车站,走走停停却要一

小时才能到。下车后又背起她,去医院或者哪个诊所。矮小的母亲双手托着小妹的腿,走几步,停下来把小妹往上挪一挪。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默默行走,仿佛在沙漠中行走的骆驼,静默、悲伤、沉重。可是小妹的病却越来越重,头发一大把一大把掉,奄奄一息。借来的钱也已经用光,父亲很绝望,他不想再给小妹治病。母亲坐在小妹床前,泪水直流,她握着小妹的手说:“孩子,你一定要挺住,妈想办法救你,只要有一线希望,妈都不放弃。”那一夜母亲久久未睡,坐到四点多钟时,她带上香和烛,跌跌撞撞往山上走去。路上黑漆漆的,寂静得可怕,偶尔听见野鸡和野兔在树林中跳跃。山路崎岖难走,母亲都没顾到这些,她只想山上的那座听说很灵验的寺院。仿佛那座寺院在她眼前闪着金光,那是她心中唯一朝圣的方向。她七弯八拐,走了一个多小时才爬到山顶上。推开虚掩的寺院的门,母亲点燃蜡烛,上了香,她泪流满面地跪在蒲团上,双手合十祈求着:“救救我的女儿。”她匍匐在蒲团上,微弱的烛光下,她的身影那样渺小,那样无助。

天亮后,母亲从寺院出来,她卖掉家里仅存的两块袁大头银圆,攥着这点钱,她又背起小妹上了去临海的车,第六次住进了台州医院。在住院时,听到同病房的阿婆说起临海城关有一位老中医,她有祖传的秘方兴许能治小妹的病。母亲十分激动,按照所给的地址,在小巷里找到那位中医的家。她背着一大袋草药回来,仿佛背着她全部希望。在老中医的对症下药和母亲的精心护理下,小妹渐渐好起来,头发也长出来了,乌黑乌黑的像刚出生的婴儿的头发。母亲的头发却全白了。母亲的背是一座山,是我们的依靠,她用全部能量为我们托起生命的太阳。

泪水模糊了我的眼,我无法表达我的思念和忧伤。在我们家境好转时,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们再也寻她不着,她留给我们只有她那微驼的后背。暮年后的菊花白如雪,凉透了寸寸思念。冷月如霜,无声地闪过天际,谁的童谣还响在我的耳旁。

母亲的背

(生长在乡野间,以文字热爱土地) 金仙春